

●徐雁平 武晓峰

是否有新书版本学

ABSTRACT The Continu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bliography for ancient books constitute bibliography for new books, studies on which may be conducted by integrating historical data of new literature, publication and culture.

SUBJECT TERMS Bibliology Studies

CLASS NUMBER G256.2

近人叶德辉面对古书无声无息的散亡,不禁发出慨叹:“风气二三十年而一变,古书亦二三十年渐稀”(《书林清话》)。站在世纪末的我们,如果回首寻视世纪初以至世纪中叶的图书,不也是有稀如星凤之感?当时熟视无睹的书本,在今天或许是深藏于大图书馆的秘笈,抑或成为极少数藏书家苦苦搜求的珍本,一般读书人难得有缘识其真面目,三两部干巴巴的书目也难读出一点书中味道和书林情趣来。古籍还有些留真谱、书影或版刻图录,凭此还可尝鼎一脔,而且明清及近现代留下的古籍版本方面的著作亦可作止渴之用;而新书呢,虽更贴近我们,却在无形之中被忽略了,研究古籍的版本学已是名正言顺,那么,是否有研究新书的版本学呢?

阿英在1935年出版的《夜航集》中有这样的回答:“旧书固然如此,新书又何独例外?版本对于新书,是一样有道理的。……譬如郭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泰东的初译本,就远不如创造社的订正复刊,而《现代》本虽是创造社所藏版,装帧上都远不如创造”(《版本小言》)。版本学研究的是书籍各种不同版本在制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征(如版刻及书写的

年代、风格、源流系统,字体、行款、纸墨、装订等),以及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征(如藏章、题识、批校等),并辨识其差异,鉴别其真伪优劣。讲版本不是单纯地为了版本,而是回到时间流程中的书本身,引起对书的关注。新书版本学是古籍版本学的延续和扩展,社会文化的变革使之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有一种古籍版本学所缺乏的新鲜气息,新书的版本从某一侧面来说是那一时代的印记,决不是什么书皮之学,从中可略窥当时出版、文化、政治及社会风尚之一斑,“注意版本,是不仅在旧书方面,新文学的研究者,同样的是不应该忽视的”(引同上)。

李大钊的遗稿经收集整理,其中30篇于1993年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书名拟为《守常文集》,但遭到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扼杀,至抗战期间,为避免牵涉旧案,遂改名《守常全集》,1939年4月以社会科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由上海北新书局负责发行,书一面世,立即遭到租界查禁,已印好的书也被没收。上海解放后不久,才恢复原名《守常文集》用原纸版刊印了一部分。同书异名,一前一后两种版本,在细微的差别中可见

这本非同一般的书的命运，亦可想象那时的政治气氛。至于“禁本”《守常全集》，据唐弢记载，在50年代已十分少见（见《晦庵书话》），不知到底有几本尚存世间？有人将钱钟书《围城》的发表本（1946.2~1947.1）和初版本（晨光版1947.5）到定本（人文版1980.10）间的文字差异进行汇校，这就是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围城〉汇校本》，从中可探讨作者对该书的精心修改和艺术追求，版本的研究从书表进入字里行间，确实大有可为（可参阅1993.3.21《文汇报·笔会》）。

用机器印刷出来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复制的数量淹没了书的个性，再也不能如古籍那样津津乐道白口黑口，也不能苛求刀法遒劲墨浓似漆了，古籍毕竟是独具风格的手工产品；但仍有不少有心人在机器的复制品中追回书的个性，除注意排版形式和印制方法外，尤其在装帧形式上下功夫，如在平装、普及本外，出版精装本、特藏本、线装本、笔边本、纪念本等。春去春来，潮起潮落，昔年的那些图书所剩寥寥，当我们回头打量它们时，书的个性又露出海面，令人刮目相看，是物以稀为贵，还是岁月使然？

鲁迅对书籍的版本是相当讲究的，他为自己的著作设计封面，如《呐喊》、《华盖集续编》，封面的底色、书名的位置及表现形式都是精心考虑过的，前者热烈厚重，后者简朴醒目；《木刻纪程》、《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等画集的封面也出自先生之手，无不朴茂可喜，其中后两种还别出心裁用中国传统的线装装订，《引玉集》收录的苏联版画是特意送往日本东京付印成书的，因为日本出版界用土制粗纸作画页底版，使版画有一种独到的粗犷美。在书刊的开本上，除用32开、16开外，鲁迅还用25开、23开，认为25开、23开比16开本方正，比32开大方。在印制《十竹斋笺谱》时，郑西谛为了节约，拟用八开纸，鲁迅则认为“看起来颇逼仄，究竟觉得寒蠢”，“不如

用六开之大方”。鲁迅自称毛边党，如毛边本《域外小说集》、《中国小说史略》，追求粗头乱服的野趣（唐弢称初版《域外小说集》有资格放入新式黄尧圃的“百宋一廛”里去）。封面的用料也很留意，他自费去日本印刷装订的《海上述林》，就有皮脊麻布面精装和丝绒精装两种版本，书名用烫金字，整体感觉厚实隆重。鲁迅对书刊的插画，书前书后的副页，书中的空白、字体的选用等，也无不精益求精。若对这些版本来一番考察，就不难发现文学巨匠的另一种令人惊叹的才华和贡献，经鲁迅之手出版的书籍，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品，他在书籍版本上有其睿见卓识，并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

新书版本的研究，自然不能忽视那时的初版本及后来的修订本、稿本，名家签名本、名家设计封面本（如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等），毛边本、线装本，名家手写影印本（譬如俞平伯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和线装新诗集《忆》，现极为罕见）。阿英还提到过“至于新的禁版书，自费刻本，也许印得很少，也许将来难以得到，尤应加以注意”；而名家批校题识本更为宝贵。黄裳曾在抗战初上海的旧书摊上淘得冰心的译作《先知》（1931.9新月书店初版），这是译者的手校本，扉页上有冰心用钢笔写的一段题记，黄裳称此书是其所藏新文学书中的“白眉”，是“善本”中的“善本”。1941年巴金为冰心编《著作集》，在“后记”中说：“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后来黄裳托巴金将此书转“还”原主（见《榆下说书》、《珠还记幸》）。几经离乱，可想译者冰心展卷时的心情，亦可见此版本的份量。

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前辈作家学者在搜集新书的同时，留心新书版本的研究，如阿英、唐弢、黄裳、姜德明、倪墨炎等的著述中，有相当的篇什涉及，为后来读书人和研究者开辟了一条路径，但对这一古装书和洋装书融合转换时期的版本有待进一步研究，结

“图书馆与经济”研讨会

●本刊记者

一次广受欢迎的研讨会

《中国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编辑部主办、《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图书馆与经济”(东北地区)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8月6~10日在吉林市举行。71个单位的104位代表参加会议,共收到论文192篇。这是围绕IFLA大会主题开展学术活动、群众性参与IFLA大会筹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讨会由《学报》、《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刊》编辑部联合倡议召开,试图达到以下3个目的:1. 主动参与学术活动,与图书情报工作者一起,共同推动并形成较为浓厚的学术气氛,从学术上为IFLA大会在我国召开做好准备;2. 加强4个期刊编辑部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加强《学报》与其作者及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联系,力图能持续地为《学报》筹集到一批质量较高的稿件;3. 通过学术交流、评选论文和颁发证书,推动基层图书情报工作者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代表们广泛认为,《学报》学术地位高,社

会影响大,主办学术研讨会具有独特的长处和特殊的吸引力。在短短两个月内,我们就收到东北三省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撰写的190多篇文章;一些代表自费参加会议;辽宁师大、黑龙江大学和东北师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或信息管理系)的师生,不仅踊跃参加东北地区图书馆界的学术活动,而且撰写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经过共同努力,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代表们普遍称颂,《学报》为东北三省的基层同志提供了学术交流和欢聚一堂的好机会,无私地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会议期间,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学报》作者座谈会。作者们广泛地畅谈了《学报》的成绩、问题和建议。无疑,这也是研讨会希望、而且已经取得的一大收获。

从总体来说,这是一次成功和广受欢迎的学术研讨会。人们普遍认为,这条路子走得对,应该继续走下去!我们期望,伴随IFLA大会筹备工作的进程,我国的图书馆学学术活动能够更加广泛、更为活跃、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合新文学史料、出版史料、文化史料的探讨,真正显现出新书版本承前启后的独特性来。

徐雁平 1989年河海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现为该校图书馆助理馆员,已发文数篇。通讯地址:

南京市,邮编210024。

武晓峰 1987年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河海大学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1994-03-12。编发者:刘喜申。)